

即可兴旺昌盛，何求残喘幸存

当教会差遣他们自己的同工到其它国家时，他们心理需要抱持的是对这些工人有长远的计划。在此篇故事中，一对中国夫妻分享他们在第一任期服侍时，在宣教地区所面临的危险。当他们试着和教会沟通他们心理、生理和灵里等方面所受到的创伤时，他们感受到无比的挫败。他们的教会不但小看他们所遭受到的折磨，也没有提供爱的关怀及支持。经过几次试图使教会了解他们的情况之后，这对夫妇最后为他们和小孩子的安全着想，不得已只好离开宣教地区。

这个见证要追溯到作为新加坡华人宣教士和家人一同去哈萨克斯坦之前、其间和之后的经历。由于性别歧视、缺乏充分准备、个人的困惑以及一次突如其来的危难，我一直在自我保存和信靠神之间苦苦地挣扎。感谢神的恩典，我现在不仅得以幸存，更是在祂里面兴盛。透过这次经历，神让我认识到宣教士关顾事工的重要性，我在下面的见证中也谈到一些我们学到的经验。

出征之前的幸存

1994年至1998年是我人生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丈夫、两个孩子和我在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兴高采烈地憧憬着前往哈萨克斯坦的宣教旅程。我们把自己视为帮助教会扩展其宣教异象并鼓励更多的宣教士投身于宣教事工的一对器皿（太 28：19—20，9：37—38）。但是在出发之前，有两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不安。我担心我们准备得不够充分，因为之前我们仅仅与一对宣教士夫妇就宣教禾场的生活进行了一次谈话，另外听了一堂有关适应环境的讲座，这就是我们为完成这次使命而接受的全部训练。当我向教会带领人表达这种担忧时，他们回答说我们肯定不会有什问题。

此外让我不安的另一点是，我们所在教会的领袖们认为作妻子的不够资格参与宣教事工。他们甚至认为为妻的姊妹们不可能蒙召去参与禾场事奉，她们只应该好好照料家庭，好让自己的丈夫尽可能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专心投入服事。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而认为女性也能参与宣教，但是我不想给大家添乱，同时也觉

得自己应该顺服，所以就没有对此深究。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仍坚信，在宣教的禾场上，神对我有一份托付。

宣教期间的幸存

来到哈萨克斯坦，我发现那里的妇女们被视为二等公民，她们的想法也得不到什么重视，这一点再一次动摇了我相信神对我有宣教托付的信念。我们团队所确定的禾场事工异象和方向中也没有充分体现出女宣教士们的作用，而这正是我认为自己能够参与的工作。我的事工主要局限于儿童工作，与成年人合作的机会非常少，因为教会认为我缺乏细胞小组事工的训练。我在神学院的两年学习以及作为牧师妻子和学校教师的经验要么被看作是无用的，要么得不到承认。到那时我常常困惑不解：“我是否在浪费生命？”不幸的是，缺乏安全感的我没有与团队中的任何人吐露心思，当教会牧师来访时我也只字未提。他们看起来都在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忙碌奔波，我怕他们批评我阻碍神的工作。

与此同时，丈夫和我与教会领导层的关系也在恶化，原因是他们不理解我们的宣教异象和策略。在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我们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在以我们为代价玩游戏。后来教会几位牧师到哈萨克斯坦看望我们，经过一次令我们耗尽心神的会面，我们的冲突也被激化到极点。那晚我们俩垂头丧气地上了床，却不知第二天一早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们。

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在丈夫开门准备送儿子上学时闯进屋。他们对我先生一阵暴打，致使他后来在医院里躺了一周之久。其中一名歹徒几次挥刀逼我，三次都差点儿把我勒死。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威胁要带走我们五岁的女儿。丈夫和我在绝望之中呼求上帝（诗 91）。感谢神，他们后来心软了，我们大大松了口气。劫案之后我好几天都恍惚不清，幸好其它几位队员帮忙照料我们，陪我到医院探望我先生，替我们做饭，而且一名当社工的队员还帮助我们作了汇报，整理了案情始末。

由于坚信新加坡的母会也会支持我们，丈夫和我就申请回国休息恢复一段时间。没想到的是，教会的领袖们并不同意我们的决定，并且竭力劝我们放弃这个打算。他们甚至派了一名顾问专程来说服我们打消回国的念头。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我们留在哈萨克斯坦来处理创伤的余波会恢复得更快。他们却不明白，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治愈劫案后的创伤，还有和他们的关系。在重重矛盾之下，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和许多的祷告，最后仍然决定回国。

回国后的幸存

回国后，我们发觉教会已经改变，而我们在离开的这几年中也有了改变。尽管丈夫和我接受了分述劫案始末的汇报和危机辅导，我们还是感觉特别孤单。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忙忙碌碌。我们努力尝试去与教会带领人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们越是努力，就越感到愤怒。经过屡次的徒劳后，我先生辞去了教会中的职务。

就我而言，原本以为回到学校任教会有助于我重新适应新加坡的生活。但当我试图向学校的上级解释自己在离开五年半后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教学系统时，她没有丝毫同情。她拿自己与我相比，说她在纽约生活两年后仍然能跟上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却全然不知生活在一个有时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没有保障的欠发达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两个月以后，我辞了职。

到此时，我已经完全崩溃。我向神发怒，抱怨他在我将自己全部的生命交托给祂之后让这一切的事临到我。我问神，“主啊，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你却离弃我？”而祂唯一的答复就是沉默。虽然我陷入重重迷茫和伤痛中，我还是紧紧抓住神，因为祂过去没有让我失望过。

重新得力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半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只能反复地述说一点，就是神永不会失败！神让我经历破碎，为的是让我得到我所需要的种种内心的医治。祂为我和我丈夫预备了一名真挚的好友，在我们最痛苦的那段时期他劝慰并

帮助了我们。这位朋友鼓励我们要相信神所赐的直觉，回应并遵行神对我们的呼召。神也把我们带入新的成长环境，喂养并重建我们的生命。我丈夫对他现在的事工非常满意，我的孩子也健康成长。我自己则有机会继续我的学业，去年毕业了。在学习期间，神渐渐向我显明祂让我经历所有那些幽谷的用意和计划。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一篇论文的过程中，神清楚明白地告诉我说，我以为已经破灭的宣教梦想事实上才刚刚开始。祂允许我有这些经历，这样我才能与日后需要我帮助的宣教士们有真正的认同。像约伯那样，我经历了神所许可的试炼，就如同银子被熬炼过，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伯 23：10）

总结教训，走向兴盛

神给了我许多有关宣教士关顾的教训。我意识到*宣教士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他们奔赴宣教使命之前、之间和之后都需要家庭、教会和朋友们的支持*（林前 16：15—18；林后 8：11；腓 1：3—5，7，4：15—16）。差派宣教士去传福音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我们的教会不能在打发他们走后就将其抛至脑后，直到他们回来时才想起他们；相反，我们应该不断地在灵命上、情感上和经济上支持他们。在宣教士出发之前，教会可以帮助他们筹措资金、请人代祷；在他们宣教期间，教会有必要派出牧养小组去帮助他们；当他们回来以后，教会可以安排细胞小组“容纳”这些宣教士，以帮助他们解决物质上的需要、与他们共同祷告并且做他们的倾听者。

我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充分做好出发和归国前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会如同一个不计算花费就盖楼的愚人（路 14：28—30）。事后我认识到，我那时本应该为适应国外的生活接受一些更周全的训练装备，然后再奔赴禾场。这种装备应该包含了解跨文化生活的原则和学习解决冲突的办法。我们当时由于是在特殊情况下回新加坡的，所以没有为返乡后的重新适应作充分的准备。理想的状况下，宣教士回国前应该提前半年就开始为自己和孩子们做准备，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谈论国内的时事、文化、流行时尚和教育体制进等。他们也需要留出时间

来与他们客居之乡的朋友们以及他们所喜爱的一些地方告别。此处的善终能为他们回国后有个良好的开端作准备。

此外，我还认识到，*关心孩子们的需求非常重要*（弗 6：4）。由于我们在宣教禾场四处奔波，我儿子二年级的大部分功课被耽搁了。他后来向我和我丈夫承认，在那段时间他常有被忽视的感觉。女儿在劫案发生时经历了极大的恐惧，害怕万一妈妈死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后来我们还必须帮助她脱离这种恐惧。现在丈夫和我正在学习和孩子们多相处、多交流，以便更敏锐地体察他们的需要。

然而我得到的最宝贵的教训是*我与神的关系是首要的*（诗 18：1，2；约 15：5）。我明白我那时太依赖人的带领和他们的意见。虽然我应该尊重教会的领导并坦诚地对待他们的劝告，但是神才是我最终应当依赖和信靠的。只有当我完全在祂里面时，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并明白神的呼召。

不可削足适履

神的心意是要让千百万迷失的人听到福音（启 7：9），但是神也关心那些在禾场上辛勤耕耘的宣教士们（罗 10：15）。中国有句俗语，不可“削足适履”，也就是不可因小失大。同样，我们不能为了向失丧的人传福音而忽视了对宣教士的关顾。让我们来帮助宣教士们，使他们不仅仅幸于存活，我们更要坚固他们的手，使他们全然兴盛。这样，我们就能共同收割那已经成熟发白的庄稼。